

三、近期中國大陸民眾政治信任及輿論觀察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賢主稿

- 近期中國大陸社會出現質疑城管、農管執法、公權力擴張、退休金銳減等輿論，對政府信任度下降。由於黨中央高度集權決策，使民眾對施政不滿的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的情況日益增加。
- 社會心理的焦躁浮動、衝突不斷，「愛國主義」甚至不敵民眾的生計考量與對現狀的不滿，政府對不利言論極其敏感而「無限上綱」，也為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不可預期的伏筆。

根據過去國際機構的調查顯示，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大陸民眾的社會安全感較高，且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也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近來經濟下行趨勢未緩、失業率急遽攀升、疫情防控亂象，以及從「動態清零」到「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大轉彎，使得民眾的社會安全感急遽下降，與此同時，對政府的信任感也不似以往。去年 11 月底在 50 多個城市所發生的「白紙運動」便是此種社會集體心理的呈現。根據此，本文對近期大陸輿論與政治信任有以下觀察與分析。

(一) 從「賣崽青蛙」談起

近期「賣崽青蛙」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遍地開花，一些穿著逗趣綠色青蛙裝，在街頭販售青蛙造型氣球，逗趣模樣幾乎成為城市街頭笑聲的來源。然而，也正因其流動攤販的性質，終究難逃「城管」的驅趕。杭州一隻「青蛙」被城管抓住，被罰面壁思過；寧波交警攔下騎電動自行車沒戴安全帽的「青蛙」，罰款 20 元。而近期引發輿論反彈的是，一隻「賣崽青蛙」在上海街頭「落網」，當場被城管要求褪去蛙皮。支持青蛙的網民主要有兩大理由，一是「不是生活所迫，誰會忍心賣兒賣女」，由於多數青蛙裝下是失業的、下班後兼差的青年，也有無業的老年人，其折射出當前經濟下行、青年失業與社會不公平；第二是「中央不是鼓勵地攤經濟與內需？」，在新一任政府上臺後，地攤經濟政策重新被點燃，甚至在「五一長假」火爆出圈的「淄博燒烤」也成為官方媒體報導的焦點，淄博一躍成為網紅城市，而「賣

崽青蛙」卻成為各大小城市街頭中被驅趕的對象。而此折射的便是對政府執法差別待遇的不滿。

(二) 各類社會保險的短缺

去年年底起，廣州、武漢、大連等地陸續出現退休人士抗議醫療保險改革的「白髮運動」，各地不少退休人士的醫保金減少五至七成不等，使民眾對醫保制度改革的反彈浮上檯面。深究其中，與近年來每況愈下的地方財政有關，由於經濟下行、房地產與爛尾樓問題，近年地方財政因鉅額防疫支出惡化，防疫支出挪用了部分醫保基金，為本次醫保改革削減個人帳戶每月金額的主因。與此類似，大陸自 2022 年起實施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金全國統籌，各省市社保系統近期陸續切換至新系統，然而上海、深圳的民眾最近卻在登錄新系統後，發現自身社保帳戶退休金的試算金額大幅減少而引發爭議。網路上紛紛出現「如何看待上海與深圳人的社保帳戶餘額一天少了三分之一？」、「我國養老金的缺口究竟有多大？」的疑問。同樣地，其根本原因也是經濟下行、疫情封控與地方財政惡化的問題，值得探究的還有兩個議題，一是連財政狀況名列前茅的上海與深圳都有此問題，那其他地方呢？二是養老保險金的「全國統籌」，是否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年代？這也無怪乎不少上海市民會說「上海的房價怎麼不納入全國的大池子一起統籌呢？」。

(三) 農管強制執法引發的爭議

繼「城管」的「城市管理執法」後，近期中國大陸多地農村出現被民眾稱為「農管」的執法隊伍，佩戴「農業綜合行政」臂章強力要求農民「退林還田」、禁止房前屋後種瓜種菜、務農需要持證上崗等，進而引發議論。此波「農管」的爭議，追根溯源還是來自於中共所擔憂的「糧食安全」，包括農管強制農民砍除種植的樹木而須改種農作物，保證 18 億畝耕地主要是要種糧食，亦即該種什麼、怎麼種，一定要統一管理。近年來，習近平不斷強調「糧食安全」，在「二十大」報告也強調的國家安全，也就是習所一再主張的「自力更生」以及「飯

碗要端在中國人自己手裡」。而縱使官方一再提出「農業綜合行政」是為了統一執法而設，其範圍有限而非大小事全管，且其執法有據。但由於「城管」的惡名昭彰，常仗著執法之便，惡性欺壓百姓，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時有所聞，近期不少「農管」在農村惡行執法，透過網路傳播而引發民眾不滿，也讓人不得不將農管與城管進行聯想。而一旦出現此種連結，也代表官方在農村要正常執法的難度增加。

(四) 後疫情時期青年與城市中產的政治信任大降

近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公權力的擴張、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年輕人在疫情時代看待自己未來的想法正在產生變化，早在去年 5 月《知乎》一篇名為「今年新冠疫情，讓你的觀念發生了哪些變化」的文章中，「比起疫情，無限擴張的公權力才讓人害怕」的回應點讚數、回應數與轉發數極為驚人，即可看出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成效及公信力都提出了質疑，且主要為青年與城市中產。首先，疫情期間過度封控使得青年失業率大增，2021 年底以來從未低於 15%，2022 年青年失業率高達 19.9%，甫公布的 2023 年 4 月數據甚至攀高至 20.4%，其中，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更遠高於一般青年。也因此，近期不論是網上串連，或是實體的行動，如去年 11 月底的「白紙運動」，青年都是對時政不滿的主要人群。其次，中產階層在工作與家庭穩定後最需要的是「穩定」，但疫情期間官方強制的防疫措施，後又出現政策大轉彎，都在彰顯出政府權力的無限制擴張，這也讓中產階層產生焦慮。因此，這 2 年社會出現從「內捲」、「躺平」、「潤學」到「人礦」的輿論，也是以這些群體為主。

(五) 差序政府信任結構大受衝擊

過往在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研究中，多有「差序信任」的研究結論，亦即從中央、省，一直到省以下的各級政府，信任程度逐步降低。由於對上級政府信任較高，也為中共中央豎起一道道施政的防火牆，一方面，每一層級地方政府都可能將民眾的不滿阻絕於地方，另一方面一旦中央出手解決問題，亦能迎來「包青天」美名。也

因此，過去抗爭民眾常舉的標語為「請中央救救我們」、「請共產黨救救我們」。然而，近來此種政府信任結構出現轉變，除經濟下行看不到盡頭外，主要還是疫情期間，各地採取嚴格的封控與核酸檢驗，造成民眾的不滿，甚至是衍生出多起「次生傷害」；而民眾多清楚，嚴格防疫政策的源頭是中央而非地方政府，這也是為何在白紙運動期間，群眾出現「直指中央」，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的抗爭口號之故。而過去十年來，地方權力不斷向中央集中，也代表前述「防火牆」的功能減弱，若此種趨勢不變，日後民眾因對施政不滿而直指中央的情事也將增加。

（六）政治信任下降後的社會治理

承前所述，正因在經濟下行與疫情封控帶來對政府信任的下降，對中共的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關係至少有以下幾個影響，首先是整體社會心理出現的焦躁與浮動，在無處宣洩下對轉而將矛頭對準他人，具體呈現在日常紛爭的增加，在街頭、公共運輸、商場中，民眾間摩擦與衝突較以往更為頻繁。其次，近期在網路上出現一波「不願為國而戰」的論戰，並擴散至中國大陸各個網路平臺，包括網易、知乎、今日頭條等網站等，主張不願上戰場的主要理由為「對社會不平等的不滿」以及「不願為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戰」，是否代表官方所帶動的「愛國主義」逐漸不敵一般民眾的生計考量與對現狀的不滿，值得進一步觀察。再者，政府對於稍有不利的言論也極其敏感進而「無限上綱」，如笑果文化公司的脫口秀演員李昊石(House)，因以「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形容寵物狗的段子，被民眾舉報「辱軍」、「侮辱『人民子弟兵』」，脫口秀演員雖有踩紅線之虞，但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與文旅局隨即對該公司與演員作出嚴重的行政處罰，官媒也大加撻伐也引發議論。最後，當前中國大陸出現的社會事件雖不致對中共統治造成立即而明顯的挑戰，但如同前述，將會對民眾的政治信任造成衝擊，也會對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不可預期的伏筆。